

第二十一章

历史

香港回归祖国，成为特别行政区，至二零零九年已迈进第十二年。香港按照“一国两制”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虽然史无前例，但确实行之有效，而且进一步巩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外国企业纷纷以香港作为发展中国和亚洲区业务的首选地点。

随着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钟声响起，香港在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后，终于重回祖国怀抱，展开新的历史篇章。

当英国国旗和香港旗降下后，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随即升起，隆重而深具历史意义的中英政权交接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完成。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居民可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权利和自由，在回归后 50 年不变。

自回归祖国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更为紧密稳固，目前有数以万计港人在内地工作和生活。此外，香港社会十分安定，经济也随着内地的蓬勃发展而增长。

考古发现

香港考古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根据沿海多处地点出土的古代人类活动遗迹，证明本港历史可远溯至六千多年前。从考古学角度来说，香港只是华南文化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学者对这个广阔领域所知仍属有限。

有人认为，本地史前文化是受到华北或东南亚地区文化入侵演变而成的。不过，愈来愈多学者相信，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在本土逐渐形成，并没有受到外来文化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在公元前四千年开始出现的最早期文化，无疑要顾及环境转变的因素。其间海平面由低于目前水平 100 米之处不断上升，淹没沿岸的广阔平原，形成今天的海岸线和环境生态。在该地区生活的人必须适应环境，否则便遭湮没。

考古发掘主要发现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青铜器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出现，这是香港史前最后一个阶段。虽然当时没有广泛使用青铜器，但香港考古遗址曾有刀、箭镞和戈等精巧青铜兵器出土，也发掘到鱼钩和斧等青铜工具。在赤蠟角过路

湾、大屿山东湾和沙螺湾，以及南丫岛大湾和沙埔村出土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足可证明青铜器在本港铸造。

青铜器时代陶器的印纹，大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几何图案一脉相承，但其中的“双F”夔纹则是该段时期区内特有的纹饰。

早期中国文献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为“越人”。因此，很可能至少有部分本港史前先民是“百越人”。

一九九七年马湾东湾仔北遗址发现一处史前墓地。该处共发现 20 座史前墓葬，15 座有人类骸骨，当中七具骸骨保存得较完整。研究显示，这些史前先民属亚洲蒙古人种，具有热带地区种族的特徵。

一九九九年西贡蚝涌发现一个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占地约 200 平方米，四周遍布多件石环心、石片、打制石器、雕刻工具，以及磨制器物。这些文物为研究香港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石器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二年九月期间，一支由香港和内地专家组成的考古队伍，对西贡沙下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所得文物，不但进一步完善香港远古文化的编年，还提供了追溯珠江三角洲当时社会与聚落形态的重要线索。

此外，在大屿山石壁、濠西洲、蒲台岛、长洲、东龙洲、港岛大浪湾和黄竹坑等地区，也发现了几何图案和状似动物图案的石刻，很可能由本地先民所制造。

秦(公元前二二一至二零七年)汉(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二二零年)时期，朝廷挥军南征，平定岭南，南迁的汉人不断增加，对原居民产生种种影响。这段动荡的历史可从本港出土的汉代钱币得到证明。不过，最重要的遗迹，当然是一九五五年在深水埗李郑屋发现的完整砖室墓。这座古墓随葬典型的汉代明器，可推定为东汉初期至中期的古迹。最近在大屿山白芒、濠西洲、马湾东湾仔及屯门扫管笏进行的发掘工作，都在文化层出土各类汉代陶制器皿、铁器和大量铜钱。此外，在旺角渠务工程地盘也发现四个陶罐。

汉代以后的考古遗迹至今所知甚少，关于本港各海滩常见的圆拱型灰窑的发掘和研究结果，正好帮助了解唐代(公元六一八至九零七年)本港居民生活的一面——石灰的使用。石灰是当时很有价值的商品，并且用途广泛，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公元十三世纪，元兵南下，结束宋室统治。香港与这段历史渊源深厚。已迁往九龙旧香港国际机场入口附近的宋王台石刻，大庙湾天后庙的宋代石刻，石壁、米埔和奇力岛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以及在大屿山稔树湾、石壁和元朗鳌磡石等多处发掘到的宋代青瓷，都是这个时期的文物。

考古研究有助认识明代(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和清代(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期间的本港历史。研究工作包括分析近年在大屿山竹篙湾出土的大量明代青花瓷器。研究结果显示，这类瓷器制作非常精巧，是输往东南亚和西方国家的外销

瓷器，在公元十六世纪初期制成。二零零一年竹篙湾遗址出土了更多明代的遗迹，其中包括具特色的明代建筑和居住遗迹。大埔碗窑遗址的考古调查发现，窑工可能早在明代已开始制造青花瓷器。本地瓷器工业一直维持至二十世纪初，共有三百多年之久。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八年在扫管笏遗址进行的发掘，发现合共有九十多座明代墓葬，陪葬品包括瓷器、铜钱和铁器等，为研究明代本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新资料。

东龙洲清代炮台的发掘，使市民可以了解炮台的内部结构，以及清末屯兵香港的军人使用的日常用品。九龙寨城的考古勘查，发现了寨城的城门遗迹和南门上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字样的石碑。启德发展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也发现了龙津石桥遗迹。该桥在一八七五年建成，是连接九龙寨城正门（东门）与海岸的一个登岸码头。

通商港口

开埠初期，由于香港地瘠山多，水源缺乏，人们认为并非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当时香港只有村民约3 650人，聚居于二十多个村落；渔民2 000人，栖宿于港口的渔船上。维多利亚港是香港唯一的天然资产，位置优越，处于通往远东的贸易通道，不久还成为与中国进行转口贸易的枢纽。

自一八四一年开埠以来，香港逐渐发展为商业中心。十八世纪末，英国人操纵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但由于中英文化不同、观点迥异，他们对当时的情况未感满意。当时中国自视为独一无二的文明大国，在广州经商的外国人，居住和其他方面都受到诸般限制。外商只准在商馆区范围内活动，而且只可在贸易季节逗留，其间家眷只得留在澳门居住。此外，外商也不得入城，又不许学习中文。中国在徵收船税方面并无划一标准，时常引起争端。虽然如此，中英商人仍能互相信任，无论交易额如何巨大，都口头成交，一诺千金。

初时，中国在贸易得利，银元大量流入。不过，自一八零零年开始，鸦片贸易蓬勃，形势即告逆转。清廷早在一七九九年已明令禁止输入鸦片，但自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丧失对华贸易的特权后，外商为图暴利，纷纷加入鸦片商贩行列，中国银元外流的情况更趋严重。有见及此，清廷在一八三九年三月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赴粤，厉行禁烟。林则徐抵粤一周，立即派兵封锁商馆，不准任何人离开，又断绝粮食供应，直至外商交出全部鸦片为止。他着令外商和船长具结，以后不得再输入鸦片，违者正法。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和其他英商被围困六周后，迫得下令缴出鸦片共20 283箱。

义律随后向英廷详细报告，并决定在接获指示前暂停通商。英侨于是撤离广州，往澳门暂居，但因澳葡总督声言难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英侨在一八三九年夏季全部退居香港港内的船舶上。

事已至此，英国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认为必须解决中英贸易关系问题。他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被迫缴纳赎命金（英侨其实没有生命危险），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使英侨能在国家荫庇下生活。

为使中国就范，英国显示实力，远征军在一八四零年六月开抵中国，于是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四零至一八四二年）。双方且谈且战。林则徐在初步谈判失败后遭撤职，由琦善接任钦差大臣。直至琦善与义律达成协议，战事才告一段落。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双方签订《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英国海军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水坑口（即现时上环荷李活道公园一带）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同年六月，义律把土地分段出售，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

两国政府都不承认《穿鼻草约》。中国视割地为奇耻大辱，举国震怒，清廷于是把琦善撤职，解京查办。英国方面，彭玛斯顿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

彭玛斯顿勋爵严厉谴责义律漠视训令，召回义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一八四一年八月，砵甸乍爵士抵达香港，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年后，砵甸乍爵士挥军溯长江而上，直迫南京，中英双方终于在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订立《南京条约》，战事才告平息。

当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务大臣阿巴甸勋爵在一八四一年向砵甸乍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的要求。砵甸乍爵士在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的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了英廷的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而且要求割让香港。

清政府还必须开放广州等五个地点作为通商口岸。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一八四三年十月缔订的《虎门善后条约》。根据条约，华人获准自由到香港经商。

租借新界

中英两国对前订条约的诠释各执一词，最后引发第二次中英战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战争的导火线为中国水师登上英艇“亚罗号”（这艘船船身为西式设计，配备中式索具）搜捕海盗，因而发生冲突。结果两国在一八五八年签订《天津条约》，英国可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国，战事暂时结束。第一任使节是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战火于是在一八五九年再起，到一八六零年才平息。

从本港早期照片所见，参与第二次远征的英军曾在九龙结营。英军发现当地环境适宜，拟保留九龙半岛驻防，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的租借权。一八六零年，战争结束，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后，德、法、俄三国曾为中国说项，欧洲各国和日本之后也相继向中国要求租借土地。其后，局势紧张，英国认为如要防卫香港，则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

根据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签订的条约，中国同意把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地域，以及 235 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 99 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中国。中国军舰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的码头，中国仍然保留该处的行政权，“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女皇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在一八九九年四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仍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新界遂成为香港的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初期发展

香港开埠初期发展并不顺利，不良分子麇集，罪行猖獗，热病和台风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不过，仍然有很多华人移居这个由外人统治的小岛。一八五一年，香港有人口 32 983 人(华人有 31 463 人，占总人口的 95%)；一九三一年，人口增至 878 947 人(华人有 859 425 人，占总人口的 97.8%)。

香港的华人只求不受干扰，故在港英政府的开明统治下，都能安居乐业。香港渐成为中国移民的聚居地，以及与海外华侨通商的中心。使用本港港口的远洋船，在一八六零年有 2 889 艘，一九三九年增至 23 881 艘。香港主要与中国通商，因此不得不顺应中国习惯，在一八六二年采用银元制。中国在一九三五年放弃银元本位，香港也随之改变币制。

香港政制采取英国海外属土常用的模式，总督由英廷任命，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由政府委任，大多数为官守议员。立法局第一批非官守议员在一八五零年委出，至一八八零年才有华人议员(新加坡出生的律师伍才(又名伍廷芳))。一八九六年行政局开始有非官守议员，而首位华人议员(周寿臣爵士)则在一九二六年委出。长期以来，香港总商会和非官守太平绅士这两个选举团体，都有权各自提名一人为立法局议员，但这项安排已在一九七二年终止。

在港居留的英国人数次力促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肯，称香港华人占多数，难以由少数欧籍人士统治。一八八三年政府成立卫生局，并由一八八七年开始以选举方式选出部分成员。卫生局其后在一九三六年改组为市政局。

最初香港政府有意从内地借调官员管理华人，但这种并行的政制从未认真施行。由于罪案日多，这个制度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废除，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同年英廷大幅修订香港总督的训令，规定“如任何法例对亚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欧籍人士则不受其限者”，总督不得批准施行。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把香港发展为开放营商贸易之地，一切秉公办理。

香港开埠以后，公用事业相继开办，计有一八六一年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一八八五年的山顶缆车公司、一八八九年的香港电灯公司、一九零三年的中华电力公司、一九零四年的电车公司等。至于九广铁路，则在一九一零年建成。自一八五一年起，香港陆续进行填海工程，较重要的是一九零四年完成的中环填海工程，以及一九

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间进行的湾仔填海工程。现在的遮打道、干诺道和德辅道，都是在中环填海之后辟建出来的。

一八四七年，香港政府推行公立学校教育制度，补助中文学校的经费。一八七三年，主要由教会营办的学校也纳入政府补助计划内。中国医学院在一八八七年成立，当时有两名学生，其中一人是孙中山先生。该学院在一九一一年扩展成为香港大学，开设文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长期动荡不安，很多华人来港避乱。中国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能藉《凡尔赛和平条约》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加上战后国民党推行急进政策，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动荡局面一直持续。

中国当局力争废除外国凭藉条约取得的一切特权，并因此而抵制外国货。不安的局势延及香港，一九二二年发生海员罢工事件，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在广州发生的事件还演变为省港大罢工。风潮虽然逐渐平息，但香港居民的生活已大受打击。当时，英国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外资利益最多，因而成为排外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反日情绪不久便取而代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条款。一九三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企图吞并华北省份，终于导致一九三七年爆发中日战争。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大批难民涌入香港。估计在一九三七年抵港的难民约有十万人，一九三八年有50万人，一九三九年则有15万人，使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口增至160万人。难民抵港人数最多时，估计约有50万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空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时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进攻香港。日军取道中国大陆出师，英军被迫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当时守军包括香港义勇军，苦战一周后，因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节投降。

日本占领香港三年八个月。沦陷时期，贸易停顿，货币贬值，粮运不继，政府服务和公用事业大受影响。不少港人避居中立的葡属澳门，澳门政府也尽量收容。日治末期，为解决粮荒，日本人驱逐大批居民离境。

本港居民虽然备受压迫，但大部分仍拥护同盟国阵线。中国游击队在新界四出活动，逃匿的盟军人员也得到村民掩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沦陷期间被囚赤柱监狱的布政司詹森（后获封爵士）随即组织临时政府。八月三十日，海军少将夏忒爵士率领英国太平洋舰队抵港，成立临时军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总督杨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复民政统治。

战后发展

战时，不少华籍居民返回内地。日本投降后，他们纷纷回港，每月几达十万人之多。香港人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已减至约 60 万人，但在一九四七年年尾却激增至 180 万人左右。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间，中国爆发内战，自国民党政府开始遭共产党挫败之时起，有很多人从内地涌入香港，人数之多，破了历来的记录。一九四九至五零年春，有数十万人移居香港，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省、上海和其他商业重镇。全港人口不断增加，一九七一年有 400 万人，一九八零年有 500 万人，一九九四年有 600 万人，目前已达 700 万人。

韩战期间，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本港经济一度停滞不前。其后，由于人口激增，香港不能单靠港口来维持繁荣，于是开始发展工业。随着纺织厂相继设立，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兴起。纺织厂逐渐增加其产品种类，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扩展至生产人造纤维和成衣，所输出的纺织品和成衣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约一半。

在过去 20 年，香港的经济逐渐转为以服务业为主，二零零九年本港产品出口只占本港出口总值的 2.3%。电讯设备、珠宝首饰及塑胶制品是本港的主要出口产品。

经历多年，制造业的生产重点逐渐由当年简单而劳工密集的产品，转移至今天精密先进的高增值产品。工业家看准珠江三角洲丰富的土地和人力资源，把生产基地跨越边界向北扩展，营运总部则仍然留在香港。这种经营模式有助推动区内经济发展，促进香港蜕变成一个服务中心。

一九六六年，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香港局势日趋紧张；一九六七年本港发生连串社会骚乱，使居民的生活全面受到影响，经济也暂时陷于瘫痪。幸而骚乱事件在该年年底受到控制，本港得以继续平稳发展。

香港的转口港业务不断发展，与内地的贸易增长尤为迅速。此外，香港的旅游业日益蓬勃，交通也大为改善。在地理环境上，香港是内地的天然门户，每年从香港启程或过境进入内地的旅客愈来愈多。

为配合各项发展，政府致力改善和增建基础设施。四通八达的道路和铁路，以及一流的港口和机场设施，使香港成为现代化都会。新建的公路，令往来偏远地区的交通大为改善，铁路网络也陆续伸展。位于赤鱘角的香港国际机场，已在一九九八年落成启用。

目前，香港有 47% 人口住在新界区的新市镇，纾缓了市区的发展压力。正在计划中的工程将继续刺激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环境。

香港经济基础日趋稳固，政府能够逐渐增加房屋、教育、社会福利和卫生方面的开支，款额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 1,554 亿元，增至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预算的 1,597 亿元。

一九五三年圣诞节，本港发生木屋区大火，约 53 000 名居民在一夜间痛失家园。政府须急切安置灾民，于是展开了公营房屋计划。时至今日，本港已有周全的公营房屋计划，提供各类租住公屋和自置居所单位。

政府资助房屋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不能负担私人楼宇的低收入家庭解决住屋需要。香港房屋委员会负责制定和推行公营房屋计划，以期达致政府在资助房屋方面的政策目标。房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有需要的家庭入住可以负担的公共租住房屋，并把一般申请人(非长者的一人申请者除外)的平均轮候时间维持在三年左右。

在知识型和全球化经济下，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大量资源，以加强香港的竞争力。由一九七八年开始，政府为每个儿童提供免费的小学和初中公营学额；自二零零八年九月起，高中学额和职业训练局为中三离校生而设的全日制课程，也免费提供。此外，专上教育仍由政府巨额资助。政府的政策是要确保学生不会因经济状况欠佳而失学。

过去十年，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改善本港的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 272 亿元，增至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预算的 416 亿元。目前，社会服务不仅在于济急扶危，也照顾市民的其他需要。

战后，内地难民大量涌入，人口激增，香港的医疗体系于是因应需求，不断发展。战后初期，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并联手志愿机构，兴建公私营医院及普通科门诊诊所，以对抗传染病。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政府继续拓展医疗基建，以配合日益增加的人口需求。

一九六四和一九七四年发表的政策文件，首度阐述了政府在保障公众健康以及为本港所有市民，特别是倚赖受资助医疗服务的市民，提供医疗护理和设施方面所作承诺。文件载列的目标，包括拨款资助更多医疗机构，大部分已经达到。此后，政府的医护政策一直以“确保市民不会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适当医疗服务”作为目标。

一九九零年，政府展开另一项重要工作，改组当时的医务卫生署，并且成立医院管理局。医管局负责管理所有公立医院，提供各项由政府大幅资助的医疗服务，同时又负责执行政府的政策，确保经济有困难的市民仍得到适当医疗服务。卫生署则一方面负责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另一方面继续处理卫生及相关的规管事宜。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俗称“沙士”)在二零零三年肆虐后，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公共卫生架构，包括于二零零四年六月在卫生署辖下设立卫生防护中心，以加强监测系统，侦察传染病的爆发和迅速应变。该中心与本港市民、内地机关、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外国机构紧密合作，对抗传染病。

随着社会日益需要受资助公营医疗服务和更趋倚赖，政府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进行多项医疗检讨，先后发表多份医疗改革咨询文件，包括一九九三年的《促进健康咨询文件》(《彩虹文件》)、一九九九年的《香港医护改革：为何要改？为谁而改？》(《哈

佛报告书》)、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的《你我齐参与 健康伴我行》，以及二零零五年的《创设健康未来》。

政府参考这些咨询工作，再在二零零八年发表《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公众咨询文件，就一系列医疗改革建议徵询市民的意见，有关建议包括加强基层医疗服务、推动公私营医疗协作、发展电子健康记录互通、强化公共医疗安全网、引入医疗辅助融资。

当局制定了完备的劳工法例，为受雇者提供福利、保障和雇员补偿，并照顾他们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此外，又提供免费就业服务，帮助求职者寻找工作，也协助雇主招聘员工。雇员再培训局为合资格人士(尤其是失业者)提供具质素的培训及再培训课程和服务，协助他们提升就业能力，以配合雇主和香港经济的需要。